

慕容氏龙城归葬习俗与民族融合

李海叶

(华南师范大学 旅游系 广东 广州 510631)

【摘要】慕容鲜卑是五胡十六国时期的重要少数民族,其在中原及辽东地区先后建立5个政权,史称五燕。在政权的各时期,慕容氏统治者都保持着龙城归葬习俗,这与其民族意识及汉化进程密切相连,是慕容氏在入主中原后努力维系政权的民族性、保持民族发祥地之统治政策中的重要一环。

【关键词】慕容氏; 龙城; 归葬习俗

【中图分类号】K 23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623(2011)03-0089-05

五胡十六国是我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其中慕容鲜卑及其所建立的诸燕政权是这一时期极具代表性的民族及政权,它先后建立五个政权,疆域囊括东北及华北地区,其间经历了亡而复兴的过程,前后绵延近百年的历史,几与十六国相始终。而且统治者重用永嘉之乱后流落到辽东的华北士族,双方结成紧密的政治同盟,慕容氏因此而崛起,完成了统一辽东和南下中原之大业,辽东时期即入仕的华北士族成为此后贯穿诸燕的一股极其重要的政治力量,其政权也因此表现出较强的汉化色彩,这在民族矛盾比较激烈的五胡十六国时代是非常突出的现象,因此为治史者所重,多有关二者关系的研究成果^①。本文试从其归葬习俗进行探讨,希望能够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探索十六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政权所走过的复杂的民族融合道路。

归葬,即死亡后归附先人之墓或旧茔,这是我国家族墓地兴起后的一种葬俗,人类社会最早以家族为单位聚族而居,因此为了让亡魂能如生者般聚而不散,免遭异族凌辱并在另一个世界中兴旺发达,自然便产生了聚族而葬的思想^①,因此,死于异乡一般要归葬先茔。我国最早的归葬墓发现于新石器时代,杨树达先生在《汉代婚丧礼俗考》对汉代的归葬习俗举出47例,自魏晋至唐沿袭不改^②,可见归葬为我国古代汉族社会影响颇广的葬俗。根据史籍记载,北方少数民族也存在类似风俗。《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传》记载乌桓族的葬俗时说“至葬则歌舞相送。肥养一犬,以彩绳纆牵,并取死者所乘马衣物,皆烧而送之,言以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③。卷80《乌桓鲜卑传》,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为乌桓

祖先的根据地,可见我国早期的北方少数民族已产生死后回归先祖发祥地的思想。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大力实行拓跋鲜卑的汉化工程,其中的一项就是“死葬河南,不得还北”^④。则在颁布此项制度之前拓跋鲜卑很多是归葬北方草原的。关于成吉思汗及元代皇帝的葬地,尽管史籍有不同说法,但是都认为,从成吉思汗开始,蒙古大汗和元朝历代皇帝都归葬于漠北的起辇谷^⑤。但总体而言,史籍关于北方少数民族的相关记载甚为匮乏,而相关的研究也十分薄弱^⑥。而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与汉族社会相比,在中原建统的北方少数民族的归葬习俗与民族意识、汉化进程有何关系?迄今学术界尚未论及,笔者不揣浅陋,撰文论之,希望能对这一问题作有益的探索。

慕容鲜卑最早为活动于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先后建立五个政权,史称“五燕”。晋咸康三年(公元337年),慕容皝在辽东自称燕王,标志着慕容鲜卑独立政权的开始。此后慕容东灭高句丽,西平鲜卑段部、宇文部,至慕容儁时乘石赵内乱,进兵中原,定都邺城,成为十六国前期的重要政权之一,史称前燕。前燕为前秦所灭亡,前燕亡后十三年,慕容氏贵族乘着淝水战后的有利形势开展复国运动,最终慕容垂领导的后燕政权兼并西燕,基本恢复了前燕的规模。后燕末期在新崛起的北魏政权的冲击下分崩离析,南逃的一支建立南燕,公元410年被东晋刘裕所灭,北奔的一支孕育了北燕政权,至公元436年被北魏所灭。下面对慕容氏诸主的墓葬地点进行考证。

慕容氏最初立国于昌黎,故早期君主死后葬于

【收稿日期】2010-09-22

【作者简介】李海叶(1976-),女,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徒河、青山。慕容廆咸和八年“夏,五月,薨于文德殿,年六十五,葬于青山”^[5]卷121,编霸部⁵。慕容皝“十五年(东晋永和四年)薨于承干殿,年五十二。冬十月,葬龙山”^[5]卷121,编霸部⁵。韩国学者金成淑指出“慕容廆埋葬在青山,这与慕容廆当时定都在棘城是一致的。慕容皝葬于龙山,与慕容皝当时定都在龙城也是密切关联的”^[6]54,是为确论。但在中原建立政权后的慕容氏诸主死后仍归葬于龙城。

升平四年(360)前燕主慕容儁死于邺都,“伪谥景昭皇帝,庙号烈祖,墓号龙陵”^[7]卷110,慕容儁载记,未言所葬之地。《资治通鉴》胡注曰“陵在龙城,因以为名。”^[8]卷101,东晋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前秦灭前燕,慕容宝逃奔龙城被获,(苻)坚诘其奔状,皝曰“狐死首丘,欲归死于先人坟墓耳。”^[7]卷111,慕容皝载记卷110。后慕容盛灭兰汗,告于(龙城)太庙,曰“赖五祖之休,宗庙社稷幽而复显。”《胡注》曰“五祖谓慕容涉归、廆(高祖)、皝(太祖)、儁(烈祖)、垂(世祖)。”^[8]卷110,东晋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则慕容儁死后归葬龙城甚明。

后燕主慕容垂于太元二十一年(396)三月于征伐北魏途中卒于上谷之沮阳,“秘不发丧,丙申,至中山,戊戌,发丧,谥曰武城皇帝,庙号世祖”^[8]卷108,东晋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九月,“章武王宙奉燕主垂及成哀段后之丧,葬于龙城宣平陵”^[8]卷108,东晋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则慕容垂死后亦从中山都城归葬龙城。

前燕末主慕容暉死于长安,慕容垂建立后燕以后,“时慕容暉及诸宗室为苻坚所害者,并招魂葬之”^[7]卷123,慕容垂载记。具体地点不详,文系于“建留台于龙城,以高阳王隆录留台事”之后,当于龙城招魂葬之,可见慕容氏诸主及宗室死后归葬龙城为由来已久之传统,故招魂葬亦于龙城进行。

此后,慕容氏从中原退据龙城,慕容宝、慕容盛、慕容熙诸主皆葬于龙城。慕容宝为兰汗所弑,“兰引宝入龙城外邸,弑之”^[7]卷124,慕容宝载记,谥曰灵帝,为之立庙,“龙城自夏不雨至于秋七月,汗诮燕诸庙及宝神庙顿首祷请,倭罪于兰加难”^[8]卷110,东晋安帝隆安二年。则慕容宝葬于龙城。慕容盛被弑,葬于“兴平陵,庙号中宗”^[7]卷124,慕容盛载记。慕容熙先为苻后营徽平陵,其后高云弑慕容熙,“葬之于苻氏墓,伪谥昭文皇帝”^[7]卷124,慕容熙载记。

综上所述,慕容氏在中原建统的期间,仍要归葬于龙城。此外,这一地区关于慕容氏墓葬的考古发掘,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慕容氏归葬后的墓葬制度提供了一些信息。

1982年《考古》第3期载《辽宁朝阳后燕崔暹墓的发现》:崔暹墓表刻曰“燕建兴十年昌黎太守清河东武城崔暹”^[9],建兴为后燕慕容垂年号。考《北史·崔暹传附崔暹传》,崔暹为崔逞之兄,清河东武城

人,“暹字宁祖,亦有名于时。为慕容垂尚书左丞、范阳昌黎二郡太守”^[10]卷24,崔暹传附兄暹传。则崔暹本为汉士族,死于昌黎任上,葬于当地。其棺槨顶上铺有一层厚约二厘米的木炭,研究者认为这是鲜卑烧葬习俗的表现^[6]68。再从棺槨的形制来看,后燕崔暹墓与同在朝阳地区出土的前燕奉车都尉墓及北燕冯素弗墓形制相同,“即前大后小,两侧有铁棺环。这种形制的木棺在辽西出现于3世纪初,它与中原地区两汉及其以前的方形或长方形的棺槨当有不同的渊源。根据目前发现的材料看,这种形制的木棺滥觞于内蒙古扎赉诺尔鲜卑墓”^[11]。即使汉族士大夫崔暹之墓也保持着浓厚的鲜卑文化色彩,可见昌黎地区墓葬的鲜卑化倾向是很浓重的,由此可以推知归葬龙城的慕容燕诸主及宗室的墓葬必含有浓厚的鲜卑文化因子。

在中原建立政权,却仍长期保持着归葬习俗,这是在怎样的思想意识的指导下进行的?与其汉化进程有何关联?这需要对慕容氏的政权建设道路作一回顾。与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其他少数民族不同,它走过了一条极为特殊的建国道路。慕容氏最初为辽东地区的一弱小鲜卑部落,关于其早期部落构成,史料匮乏,唯《晋书》卷九十七《吐谷浑传》载首领涉归时分国与庶长子吐谷浑与嫡长子慕容廆,前者得一千七百余户(后者不详)^[7]卷97吐谷浑传,可见本族人口较少,故常为周边部族宇文部、段部所欺陵。史称“时宇文、段氏方强,数侵略廆,廆卑辞厚币以事之”^[8]卷82西晋太康十年。双方时有战事发生,最严重者为东晋太兴二年(319)平州刺史崔毖联合宇文部及段部进攻慕容部及咸康二年(336)段部及宇文部乘慕容部内乱进攻其都城的两次战役,慕容氏几为其所灭。可见慕容氏早期的生存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其政治之转折在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汉士族的涌入,史称“是时流民归廆者数万家”^[8]卷88西晋建兴二年,“流民多于旧土十倍有余”^[7]卷109,慕容皝载记,成为慕容氏辽东政权极其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12]。由此慕容氏迅速强大起来,首先统一了辽东郡县。崔毖为河北大族,于永嘉之际被幽州地方势力王浚任命为东夷校尉,逐渐掌控了辽东郡县的军政,于太兴二年(319年)为慕容氏所灭,其统下的辽东诸郡县尽归于慕容氏。咸康四年(338年)灭段氏,(段部首领)段辽及其部众“归降了慕容氏”^[7]卷109慕容皝载记。东晋建兴二年(344年)灭宇文部,“徙其部人五万余落于昌黎”^[7]卷一百九慕容皝载记2822。至此,最强大的两个鲜卑部落段部及宇文部皆以部族整体的形式进入于慕容氏,此外,慕容氏还兼并了这一地区若干散落的鲜卑部落及东部的百济、新罗、高句丽等族。那么,慕容氏和统治下的汉士族和诸少数民族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文献保存下来辽东时期汉族官员封谥的上疏:

句丽、百济及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势所徙,咸有思归之心。今户垂十万,狭凑都城,恐方将为国家深害,宜分其兄弟宗属,徙于西境诸城,使不得散在居人,知国之虚实。^[7]卷109慕容载记。

可见慕容氏与辽东时期所兼并的诸少数民族处于强烈的敌对关系中,因此慕容氏立国依靠的是永嘉之乱后涌入辽东的中原汉士族,二者结成政治同盟共同构成辽东政权的核心统治力量,所兼并的诸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处于被压制的地位,关于此点,拙作《慕容鲜卑的汉化与五燕政权》已作详细考述^[13]。这一建国道路给予慕容氏今后在中原的统治以深远影响。在这一特殊的民族的及政治的背景下,前燕辽东政权培育了一大批根基深厚的汉士族,包括清河崔氏、清河房氏、太原王氏、平原刘氏、清河张氏、清河傅氏、勃海封氏、勃海高氏、辽东李氏、阳平路氏诸家族,其中因地缘关系,尤以河北士族为胜,唐长孺《北魏的青齐士民》早已作出经典性的论述^[14]。此后随着慕容氏统治重心的南移双方的政治结合更为紧密。慕容氏南下中原后建立的第一个政权是前燕,定都邺城,统治区域除辽东地区外,包括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的大部,统治重心已从辽东南移至华北地区,以冀州为其核心;此后,前燕为前秦所灭,淝水战后鲜卑贵族慕容垂在河北开展复国运动,建立后燕,定都中山,虽然疆域有所缩小,但基本维系了前燕时期的疆域,仍以华北为统治重心、冀州为核心。我们看到,慕容氏自辽东南下后,政权建设道路十分坎坷、历经覆亡,但长期以来一直以华北为统治重心,由此维系了自辽东以来的河北士族的势力。他们追随慕容氏南下,家族仕宦于前燕、后燕,绵延不断,并在后燕灭亡后从后燕入仕于北魏,对北魏初年的政治建置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在《魏书》中留下了丰富的记载。可以说,汉士族与五燕政权在政治上的紧密结合,是历史与现实政治的需要双重原因所造成,但因此给予诸燕政治及统治者以强烈影响,与十六国时期的其他民族政权相比,慕容氏政权表现出较浓厚的汉化倾向,被视为五胡十六国时期汉化的典型代表,前文已论及,不复赘言。

可以说,汉士族与慕容氏政治的结合及给予它的影响贯穿十六国慕容氏政权始末,是其政治发展的一条主线,亦已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但同时,为治史者所忽略的另一条主线隐现于慕容氏政权的发展历程。慕容氏从辽东南下中原建立政权后,其统治形势发生变化,为了维系政权的民族性,慕容氏的统治者进一步加强了本族的统治力量,此外辽东时期为慕容氏所兼并的诸胡日渐完成与慕容氏的融合、其政治势力也逐渐凸显,因此与辽东时期相比,大量的慕容鲜卑及辽东时期所兼并的诸胡入仕慕容氏政权,打断了汉士族对汉式职官系统的垄断,占据了政

治上的中枢位置,汉士族的地位与影响力日渐式微,不复辽东时期^[13]。此后,在淝水战后后燕的复国运动中,慕容垂进一步吸纳了大量乌桓、屠各等少数民族部落,成为其复国运动中所依恃的主要力量,因此,复兴后的后燕表现出强烈的鲜卑化倾向,复国运动时归附的和前燕辽东以来所兼并的少数民族大量入仕后燕、占据着核心统治地位,已取代华北士族成为慕容氏之外的最重要的统治力量,与此同时,后燕的最高统治者乃自称皇帝,以太子为“大单于”,重建胡汉分治的二元体系,前燕中原时期业已消失的胡汉分治重现于后燕政权。此后,后燕在新崛起的拓跋鲜卑的打击下灭亡,一部分鲜卑贵族退据龙城延续后燕国祚,最后为鲜卑化的汉人冯跋所取代,史称北燕,发育成为一个完全鲜卑化的政权。

我们看到,永嘉之乱后慕容氏的统治者与中原汉士族在辽东建立了联合政权,但这是在特殊的民族政治背景被迫选择的建国道路。虽然目前学术界对华夏族的形成仍存有争议,但是至迟在春秋以后,“中国”、“华夏”的概念已经产生,此后历经秦汉三百余年的大一统,“华夷”的观念进一步得到深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五胡乱华”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传统^④,可以说是我国民族融合的初始化时期。无论学术界怎样评判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汉化问题,但毫无疑问十六国时期存在着较激烈的民族矛盾,民族意识、民族隔阂也是这一时期较突出的问题。即使在汉势力比较强大的慕容氏辽东政权也未能避免。慕容廆攻灭平州刺史崔毖,获渤海大族高瞻,高瞻拒不出仕慕容氏。慕容廆劝曰:“奈何以华夷之异,有怀介然?”^[7]卷108慕容廆载记。这虽为慕容廆劝导高瞻之言,但说明他本人也明确意识到华夷有别。此后慕容儁南下在中原即位时说:“吾本幽漠射猎之乡,被发左衽之俗,历数之录宁有分邪!”^[7]卷110慕容儁载记。这与此前羯胡石勒所言“自古诚胡人而为名臣者实有之,帝王则未之有”的话如出一辙^[7]卷104石勒载记。可见虽历经长期的合作,慕容氏仍无法泯灭这种深刻的民族隔阂感。直至南燕时期,鲜卑贵族慕容镇谓汉族官员韩轸卓曰:“今年国灭,吾必死之。卿中华之士,复为文身矣。”^[8]卷115东晋义熙五年。这是南燕末期都城广固面对东晋军队的围攻危在旦夕时的事情,此时慕容鲜卑仍把已经合作共处了一个多世纪的汉士族与本族明确区分开。来自慕容鲜卑的民族意识与民族隔阂是如此的深刻与持久。另一方面,入仕于慕容氏政权的汉人士族的态度也值得注意。前燕黄门郎明岌将死,诫其子曰:“吾所以在此朝者,直是避祸全身耳。葬可埋一圆石于吾墓前,首引之云‘晋有微臣明岌之冢’,以遂吾本志也。”^[16]卷160三十国春秋。从明岌所任黄门侍郎之职来看,这已是慕容氏进入中原称帝之后的

事了,仍不能泯灭民族家国之感,入仕慕容乃是迫于生计。这种民族隔阂不仅体现在意识层面,太和五年(公元370年)前秦王猛大败前燕慕容评军队,攻占邺都,“初,燕宜都王桓率众万余屯沙亭,闻评败,率鲜卑五千奔龙城”^[7]卷111慕容儁载记,而大部的汉族士兵被摒弃。可见鲜卑人之间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纽带是很强的。当慕容氏从辽东南下,在中原建立政权,统治形势发生变化,自辽东时期慕容氏和汉士族之间就存在的民族问题开始凸显,并给予其此后的政权建设以深远影响。慕容氏开始努力维系政权的民族性,正如上文所论述的,与辽东时期相比,中原时期政治势力的更张就是这一行为的结果。与此同时,慕容氏对龙城的经营也这一统治思想的结果。

龙城地区为慕容鲜卑的龙兴之地,其南下后,这里仍为多种少数部族的生息之地。前秦灭燕,以苻洛为安北将军、幽州刺史,镇龙城。太元五年(380)年,苻洛反,“分遣使者征兵于鲜卑、乌丸、高句丽、百济及新罗、休忍等诸国,并不从”^[7]卷113苻坚载记上。此时的鲜卑、乌丸皆未有统一政权,此处的“国”指少数民族的“部”甚明。因此,龙城保存着浓厚的鲜卑风习。北燕主冯跋的先祖为长乐汉人、西燕慕容永的将领,在西燕灭亡后被谪徙龙城,“既家昌黎,遂同夷俗”^[3]卷5海夷冯跋传,可见龙城地区鲜卑势力之深厚。正因为如此,龙城地区成为慕容氏的根据地,被异常重视。

首先,历朝皆以宗室诸王重镇之,在行政建置上设尚书台,曰“留台”。永和八年(352)慕容儁于蓟称帝,“建留台于龙城,以玄菟太守乙逸为尚书,专委留务”^[8]卷99东晋穆帝永和八年。这是慕容氏设龙城留台之始,尚委以汉人,但随着慕容氏在中原统治的深入,其龙城留守皆任以宗室诸王。永和十年(354),以慕容垂为“侍中、录留台事,徙镇龙城”^[8]卷110卷99东晋穆帝永和十年。前燕后期,“以镇东将军渤海王亮镇龙城”^[8]卷102东晋海西公太和五年。后燕建立后,始以辽西王慕容农为“使持节、都督幽平二州、北狄诸军事,幽州牧,镇龙城”^[8]卷106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继之以高阳王慕容隆为“都督幽平二州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幽州牧,建留台于龙城,以隆录留台尚书事”^[8]卷107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参合陂之战后,慕容隆帅师赴援中山,“以清河公会录留台事,领幽州刺史,代高阳王隆镇龙城”^[8]卷108东晋孝武帝太元二十年。以上诸人皆为慕容宗室之俊秀,如后燕时期慕容垂后段氏以太子慕容宝非帝王之才,曰“辽西(慕容农)、高阳(慕容隆)二王,陛下儿之贤者,宜择一以树之”^[8]卷108东晋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慕容会为慕容宝庶子,“多材艺,有雄略,垂深奇之”^[7]卷124慕容宝载记,遗命以慕容会为太子。

其次,龙城驻扎着大量军队,是中原政权重要的

储备力量。参合陂之战后燕大败,军队损失惨重,慕容垂命慕容隆“悉引其(龙城)精兵还中山,期以明年大举击魏”,“春,正月,燕高阳王隆引龙城之甲入中山,军容精整,燕人之气稍振”^[8]卷108东晋孝武帝太元二十年。北魏围攻中山,龙城镇将慕容会赴援中山,适值慕容麟叛出中山,“宝恐其逆夺会军”^[7]卷124慕容宝载记,乃弃中山而出奔会军。可见龙城兵力之重要。

慕容氏对龙城的苦心经营,实寓深意。升平四年(360年)前燕中原时期的第一代君主慕容儁死,郡国扰乱,国势极不稳定,鲜卑贵族慕容根语太后可足浑氏曰“今天下萧条,外寇非一,国大忧深,不如还东(指辽东)”^[8]卷101东晋升平四年,此处的“东”即指慕容氏龙兴之辽东龙城地区。太和五年(370年)前秦灭燕,前燕主慕容暕奔龙城,同时燕宜都王慕容桓率鲜卑之众退保龙城。后燕时期都城中山在北魏的围攻下危在旦夕,后燕主慕容宝等奔龙城^[7]卷124慕容宝载记。可见慕容氏在中原建统的同时,一直把龙城地区作为发祥地、根据地来经营,这既是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又是为避免完全被汉化的深层的民族意识的反映。历代燕主皆归葬于龙城地区,就是这一统治思想和政策中的重要一环。经过慕容氏的苦心经营,龙城实质上成为与中原政权并立的另一个政治中心。

综上所述,归葬习俗与民族意识、汉化进程密切相连。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慕容氏走过了一条十分曲折的民族融合道路。在其与汉士族保持政治合作的同时,一直在努力维系政权的民族性,这一问题在入主中原后尤为突出,其对龙城民族发祥地的经营就是这一统治思想的结果,历代燕主的龙城归葬习俗又是这一统治政策中的重要一环。这对于我们的启发是深刻的,民族融合是一个非常漫长、曲折的过程,往往充满了反复性。慕容氏此后的民族发展道路也验证了这一点。后燕退据龙城后又延续了将近40年的国祚,重新发育成一个鲜卑化的少数族政权,在中原累积了数年的汉化成果也付之泡影,此后为北魏所灭,成为代北鲜卑的一部分,最后由北魏进入隋唐,至此才完全融入中原民族,其汉化也因此经历了一个艰难回环的过程。

注 释:

- ① 参考郑小容《慕容鲜卑汉化问题初探》(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文库,1989年)、刘国石《鲜卑慕容氏与赵魏士族》(《吉林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要瑞芬《试论后赵、前燕、前秦统治政策汉化成分之差异及其原因》(《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邹洪礼《论中原士大夫对前燕慕容氏封建化的影响》(《新疆师大学报》1985年第1期)、罗新《五燕政权下的华北士族》(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第4卷)等文章。

- ② 参考韩国河《魏晋时期丧葬礼制的承传与创新》(《文史哲》1999年第1期),陈忠凯《唐代人的生活习俗——“合葬”与“归葬”》(《文博》1995年第4期)。
- ③ 孙进已、干志耿《我国古代北方各族葬俗试析》(《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3期),主要从葬法(土葬、火葬、天葬)、棺槨、封数、随葬品等角度进行探讨,关于少数民族的归葬习俗并未谈及。
- ④ 参见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田继周《夏族的形成及更名汉族》(《国际汉民族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李志敏《“汉族”名号起源考》(《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3期)、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367页)、江应梁主编《中国民族史》(民族出版社,1990年,106页-107页)。
- [参 考 文 献]
- [1] 靳凤林.死亡与中国的丧葬文化[J].北方论丛,1996(5).
- [2] 范晔.后汉书[M].中华书局,1965.
- [3] 魏收.魏书[M].中华书局,1974.
- [4] 亦邻真.起辇谷和古连勒古[J].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3).
- [5] 李昉.太平御览[M].中华书局,1960.
- [6] 金成淑.慕容鲜卑文化研究[D].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文库,1999.
- [7] 房玄龄.晋书[M].中华书局,1998.
- [8] 司马光.资治通鉴[M].中华书局,1956.
- [9] 陈大为.辽宁朝阳后燕崔暹墓的发现[J].考古,1982(3).
- [10] 李延寿.北史[M].中华书局,1997.
- [11] 田立坤.朝阳前燕奉车都尉墓[J].文物,1994(11).
- [12] 李海叶.汉士族与慕容氏政权[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4).
- [13] 李海叶.慕容鲜卑的汉化与五燕政权[D].北京大学博士论文文库,2005.
- [14]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M].中华书局,1983.
- [15] 张金龙.北燕政治史四题[J].南都学坛,1997(4).
- [16] 虞世南.北堂书钞[M]//唐代四大类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Long Cheng Funeral Customs of Murong Family and National Amalgamation

LI Haiye

(Tourism Departmen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510631)

Abstract: Murong Xianbei was an important ethnic minority group in the period of Five Ethnic Minorities and Sixteen Kingdoms. It successively established five regimes in central China and East Liaoning, which are called Five Yans in history. In each period, the rulers of Murong family maintained the Long Cheng funeral custom which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ir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their chinesization process. It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ruling policies of the Murong family in order to maintain its national characteristic and to preserve its birthplace after it began ruling China.

Key words: Murong family; Long Cheng; funeral custom

【责任编辑 张晋海】